

## 靈程地圖

在變化萬千的現代社會中，行走天路的朝聖者常需要一份更新版的地圖，這份地圖建構在熟悉的地理上，卻能標示出最新的路線變化，指引尋路的人。



Photo by Isaac Benhesed on Unsplash

# 從民族性看靈性操練

不論是安靜靈修、默想，或火熱敬拜、通宵禱告，不同民族帶出不同的靈性操練模式。在靈性追求同時，可以考慮民族性與文化特質，尋找切合的培育方式。

大學時代，因參加學生團契，認識不同宗派的弟兄姊妹，彼此實踐信仰的方式不同，有人主張要天天五點起來讀經與背經，有人每個月上禱告山祈禱。對於「好基督徒」的表現，也有不同衡量，有的注重言行舉止端莊，有的追求樂意捨己助人的犧牲精神，或是時時活出喜樂的狀態。我感到每種追求都很祝福人，只是身在不同的教會傳統，評估靈性成長的方式焦點各有不同而已。

當時，我也參加許多機構與教會的信仰造就課程，羨慕大家所敬佩的屬靈前輩，他們似乎有些特質，讓人感到與眾不同。也常聽導師舉出教會歷史的例子和見證：宣教士如何徹夜禱告產生靈命復興；哪些傳道經過禁禱，經歷了上帝神

奇地介入而扭轉危機。這些故事令人感動之餘，我也試著分析他們的內心與行爲，有何特殊之處。然而，隱約之中，我卻感到他們所處的年代與環境與我相距甚遠，他們被推崇的靈性敬虔表現，似乎不太能原樣照搬到我的處境。

## 跨文化的教堂體會

旅居歐洲十年中，常有機會到東歐旅行，體會歐洲不同歷史與宗教發展的多元風貌。此外，偶爾也和先生開車到鄰近國家，體驗城市與鄉村、內陸區域和沿海差異明顯的生活型態。而不同國家、地區的文化所推崇的靈性敬虔，也常顯出層次上的不同。這些經驗讓我領悟：在歷史與區域的分隔下，教會呈現了豐富的信仰樣貌，而神的恩典以諸般的方式臨到歷代人們的生命中。

有一次，我走進一間奧地利山區小教堂，見到駝背的老伯伯，在星期六的黃昏把一盆小白花安放在聖壇上。之後，他靜靜地坐在板凳上，望著前方的蠟燭，黃昏的斜陽從窗縫射入，漂浮在空氣中的微塵，在他頭上的餘光中飛舞，他灰白的頭髮散發一種柔和的亮光。教堂的晚鐘在此刻響起，於是他起身，深深鞠躬後，緩緩一跛一跛地走出教堂的木門。坐在後面暗處角落的我，默默地被這單純的敬虔打動。當我走出戶外，天色漸晚，望著遍野的小白花，感到上帝在大自然與教堂內，紀念了老伯伯的心意。

在比利時進修靈修學期間，發現比利時的古老教堂和德國一樣，大多座落在市區老城的中心，而彌撒聚會的氣氛多偏莊重。聚會前，多數人會提早到教堂，獨自安靜一角。聚會講道不超過三十分鐘，之間穿插不同的禱告與禮儀。會後，仍有不少人跪在凳前的禱告墊，停留默思。週日教堂外面，常常就是假期市集聚集地，走出教堂的家人與朋友通常會多逗留一會，欣賞小攤位的貨品，或在廣場一起喝飲料、用餐。教堂的崇拜時間與市區的假

日社交生活連接在一起。歐洲的教堂通常是參觀景點，主日黃昏，有許多遊客會到教堂小憩，點上一根蠟燭，欣賞教堂中的風琴演奏，讓心靈在吵雜的商業區找到一處神聖空間。一千多年來，歐洲許多教堂仍矗立在城市中心，以未曾間斷的鐘聲，呼喚民眾到此敬拜，也打開一扇門，接待懷著不同期待走進的過客。

每當遇到宗教節期慶典時期，教堂外的廣場更成了民眾的歡慶處，教堂內精心安排的聖樂與聖禮，在四季的循環中，與教堂外的慶典互相連結，於公共空間見證她獨特身分與服務。在春夏秋冬的運轉中，教堂變成市民心中一種象徵，她代表著上帝繼續同在與恩典流露之處，承載許多靈魂的朝聖之旅。許多歐洲國家的信徒，是在自身的歷史與文化中體會信仰的傳承，在社群生活中產生對信仰的多層次理解。雖然在歐洲的信仰傳統中，較少聽到「廣傳福音、為他人得救悔改、努力建造天國」的禱告，但從教會群體的語言和行動可知，教會的存在與服務鄰舍、關愛大地、祝福家園是分不開的。

## 從民族性看靈性成長

因為旅居歐洲與研究靈修學，我的視野逐漸擴展，除了留意不同的靈修傳統，如何影響教會群體在實踐信仰的差異，也思考到不同國家的文化如何影響教會的實踐。廣義而言，文化包括族群整體的生活方式，涵蓋風俗習慣、行爲規範、語言文字、教育、文學藝術、音樂、道德態度、宗教實踐，及價值觀念的複雜組合體系；文化體系是有機體，會隨著時空而產生動態的變化。不同國家或區域的文化，常在歷史不同時期呈現變化的現象，而生活在其中不同年代的人，也置身於這些現象與特徵在歷史中的延續與創造。

民族性又可稱之為民族性格，<sup>1</sup>若按照翻譯也可以稱之為「國民性格」。在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早期，這個領域的研究興起，與人類學

多向度的分支研究發展有關，<sup>2</sup>我寫論文時，民族學（Ethnology）的研究特別影響我在實踐神學（Practical Theology）的思考，從種族與國家群體的歷史與文化的角度，以對比反思的方式，重新評價我們對於不同種族與階層劃分的分類法。我認為，民族性格是由一個民族共同的歷史與文化，薰陶而成穩定的精神特質與行為特徵之總和，有其傳統的傳承特性，也隨著時代與環境轉變而變遷。在某一定程度上，民族性格的形成，與該民族文化有內在的聯繫，因此，一個國家的文化變遷也會塑造民族性的動態改變。<sup>3</sup>

近年在香港，民族性的研究仍屬開發中的領域，有些大學更進一步為中國人開發本土的心理測試，希望能研發屬於中國人個性量表，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張妙清教授及其團隊研發的「跨文化個性測量表」（CPAI），被視為首個貢獻超越西方測量方法的非西方個性測試。量表結合了文化特殊性（emic）和文化普適性（etic）的項目，測量不同文化的人格特徵。<sup>4</sup>這些研究成果提醒我，如何更宏觀地解讀不同族群的特質與特徵，同時要敏銳察覺不同區域的華人適用的靈性成長方式，並不盡相同。

## 民族性與靈性操練

從靈性操練的角度而言，有些操練對某種文化的民族性或許有獨特的果效，如：感到聖靈充滿或基督的同在，領受異象或特別使命，帶出傳福音或宣教的火熱。這些都是神所賜的寶貴恩典。然而，若只顧模仿他人特殊的方式及追求果效，反而會忽略不同的教會群體特質，可以經歷神不同的恩典。

我認為「靈性」或「靈命」（spirituality），可以指一個人因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而有的新生命。這新生命藉著聖靈的更新，使人得以日漸脫離自我中心，經歷轉化（transformation）而成長肖似基督，並在他／她的生活、服事與工作中，

因著感悟三一上帝的呼召，積極地回應與敬拜祂，發揮作光作鹽的見證，活出在基督裡的新人性（humanity），並參與祂國度、展現召命。<sup>5</sup>整全（integral）的靈性觀所涵括的，不只是內在、個人和當下的向度，也包括群體性、社會性與末世性的多向度（multi-dimensionality）。因此靈性操練注重的是整體生命的成長，而不是一套有效或不變的操練模式。

許多有心的靈命培育者，有時期待運用他人有效的方法、容易學習的步驟幫助人成長，也積極地鼓勵弟兄姐妹，嘗試不同的靈性突破方式。這些努力容易帶給學習者可依據的方向與框架，但有時也會造成初學者只學到外在模式，卻沒有深刻的內在經歷。這些情況常來自許多因素，其中應當考量對其他民族有果效的靈性操練方式，不一定全都適合自己所在文化的教會，教會整體的特質因著與其他國家的民族不同，一些信仰表達形式或儀式，也不能全然照搬而實踐。

以近十年教會對敬拜模式的討論為例，許多人效法韓國教會的通宵禱告，或是向大型聚會中群體高聲歡呼敬拜看齊，期待能帶動會眾進入聖靈裡火熱敬拜。但其實敬拜注重的不只在於方式，而是在於神學的深度，例如，教會間不時出現「舊曲新唱」，傳統聖詩的歌詞蘊藏著豐富的神學觀，教會可藉此教導及提升信徒的靈性，進入發自內心的敬拜，即便是年輕人也可以被傳統詩歌吸引。也有教會傳道提出，若能研究當地的文化與民族性，結合福音，便能促使各族各民用他們獨一無二的精采文化去認識和敬拜上帝。每個族群若能各自按固有的民族特質和獨特的文化特色敬拜，反而能展現神多元豐富的恩典。<sup>6</sup>因此，靈性操練需要強化的，不只是形式上的改變，而是要深化背後所傳達的神學、理解整全的靈命成長。我認為各區域的華人，可以在考慮民族性的適用性下，尋找切合自身特質的培育方式。

## 民族性與當代靈性議題

隨著疫情擴散到歐美，不少觀察者指出，過去西方國家引以為傲的「自主權、尊重個人意願、個人自由」等特色，在疫情的衝擊下，顯出其民族特性中「不夠自律、重視個人自在生活」的一面，這種態度也間接促成疫情蔓延。反觀亞洲許多國家的人民，為了防疫則顯出民眾高度自律、民間互相督促的努力。<sup>7</sup> 這提醒我們，從民族性思考當代的靈性問題時，要反思個人主義的過度發展是否強化人性自我中心的議題。另外，疫情也把不同國家的脆弱暴露出來，包括醫療制度的不健全、政治問題的嚴重化、邊緣團體被忽略、資源的分配不均。許多媒體與宗教人士提出，比病毒更可怕的反而是人們為了自保而犧牲他人，不認錯的傲慢與欺騙，災難中的掠奪與侵略。

民族性的研究要正視人性與社會性的邪惡，反省自己民族的人觀與民族性的弱點和灰暗處，將靈性轉化聚焦回到基督的福音，在神學反思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洞見與出路，也在民族性的更新上貢獻人性論的角度。 ❀

## 附註

1. 參國家教育研究院「雙語詞彙資料庫」網站：<https://terms.naer.edu.tw/search/?q=%E6%B0%91%E6%97%8F%E6%80%A7&field=ti&op=AND&group=&num=10>。



潘怡蓉，台灣校園福音團契是她信仰建構的啓航點；中神道學碩士與心理輔導碩士畢業後，她最美好的回憶是在德國宣教、到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教牧學與靈修學。目前除了在中國神學研究院教學，也擔任香港聖經教會顧問；並參與國際學術期刊 *Spiritus* 的編輯委員會。

2. 參 Robert Layton, *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 Anthropology*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8), Conrad Kottak, *Anthropology: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*(New York: McGraw Hill, 2008), and Homayun Sidky, *Perspectives on cul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*(Upper Saddle River, NJ: Pearson Prentice Hall, 2004)。
3. 筆者最早思考文化與民族性的議題，受錢穆先生的影響，參錢穆，《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9。
4. 參香港中文大學「中大研與學」網站，〈中西思想交匯〉，取自：<https://www.iso.cuhk.edu.hk/chinese/publications/research/article.aspx?articleid=58865>。
5. 靈修學者施奈德斯 (Sandra M. Schneiders) 定義靈性為「通過自我超越，朝著自己所感知的終極價值，有意識地參與生活之經驗整合」，她提出基督教靈性的特殊在於「當三一上帝透過耶穌基督啓示、透過聖靈傳達了終極價值的視野，這樣的自我超越就是在復活神蹟和教會群體的脈絡中，基督徒根據對信仰、現實的理解，和上帝、他人的相處」。參 Sandra M. Schneiders, Essay, in Philip Sheldrake, eds., *The New SCM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*(London: SCM Press, 2005)。
6. 參潘凱玲，〈繼續·召命——民族敬拜學〉，《基督教週報》，取自：<http://www.christianweekly.net/2017/ta2029337.htm>。
7. 參麥明晴，〈一場肺炎，民族性的照妖鏡〉，《聯合新聞網》，取自：<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339/4419455>。